

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

中国作协创作室 文艺报 合办

对新大众文艺浪潮中命名策略的观察

马忠

“快递诗人”“烧烤诗人”“保安作家”“清洁作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作家、诗人不再以风格、题材、流派来划分,而是被贴上了职业身份的标签,由社会角色来定义。这种命名方式是否合理?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文化逻辑?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各类冠以职业前缀的“××诗人”“××作家”称谓,为何涌现?长期以来,社会上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偏见,认为文学创作与普通人关系不大,特别是被称为“文学殿堂里的璀璨明珠”的诗歌,更是文人雅士的专属精神领地。理性地看,这样的观念肯定存在问题,因为任何文学样式的诞生,都是由普通人的一声感喟、一段讲述发展而来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了。由此,文学与普通人固有的紧密联系,被很多人忽视了。现在,随着新大众文艺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基层劳动者开始参与写作,其中不乏质量优秀的作品。为了便于传播推介,出版机构、媒体往往依据写作者的职业身份加以标注、命名。

“职业+诗人”“职业+作家”的命名方式自带话题性、冲突感与传播力,无疑是流量时代较为便捷、较为讨巧的宣传方式。正是这种职业身份与诗人、作家称谓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在风雨里奔波的外卖骑手、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劳作的工人、在井下默默挖矿的矿工,通过自己的写作,不断地走进媒体的视野。媒体借助身份反差制造热点,用励志故事吸引点击,客观上让基层写作走出了小众圈子。对于他们来说,这份职业前缀无异于一张叩开文学殿堂的入场券。“诗人”“作家”等字眼,是对职业偏见的温柔对冲,是对精神价值的坚定捍卫。这一命名方式让更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及其作品被看见。

来自各行各业的诗人们,对于这一命名方式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乐于接受这样的命名方式,因为他们深知,如果没有这个标签,自己的写作不会被这么多人了解。有的人则反对这样的命名方式,因为他们认为,自

己就是写作者,和那些所谓的专业诗人没有太多区别,希望大家多关注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仅仅关注自己的职业身份。甚至有作者明确表示,自己努力写作,就是为了摆脱“农民”“农妇”这样的标签。当然,还有很多写作者对此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作为评论者,我们需要对这类现象采取辩证的态度。凡事皆有两面。任何一种现象出来,我们总要为其寻找一种命名。这种命名,很多时候是偶然的、约定俗成的,并非某个特定个体或者群体故意推出来的。而且,一旦命名,有时候也不免陷入“标签化”的境地。这是因为,一种命名只能彰显对象的一种特征,但也可能遗漏其他方面的特征。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某一种命名方式是否合理,这有待时间的考验。“××诗人”“××作家”的命名方式,之所以引起一些人的争论,是因为大家意识到,这可能会导致读者“以职业出身遮蔽文本价值”。基层写作者有着特定的职业背景,公众可能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个人经历,而不是作品。时间一长,鲜活、独特、充满个性的写作者,被简化成统一模板的“底层励志符号”;对于内在的文学探索、艺术追求、精神表达,人们反而关注得不多。

最值得注意的,是不要让标签“框住”诗人们的写作路径。以前,我们就有“打工诗人”“打工诗歌”的说法。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如果我们把打工诗人永久捆绑在“打工”处境之中,要求他们只能固守打工现场,本质上是一种荒诞的逻辑绑架。诗歌是精神性活动,其力量与价值不取决于写作者是否停留在特定环境,而取决于其内心的真诚与作品本身的分量。机械、单一地理解打工诗歌写作,只会走进狭隘的死胡同。这些看法,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诗歌现场,依然有启发意义。

实际上,这样的命名现象,不仅存在于文学界,在艺术界也同样盛行。对于“农民书法家”“清洁工画家”等称谓,人们早已屡见不鲜。这些创作者大多有着本职工作,文艺

创作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或者第二职业。在被大众看见之前,他们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而媒体赋予的身份标签,让他们得以从平凡的职业角色中走到台前。从这一点来说,这一命名方式并非全无积极意义。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命名方式就天然地认为这些写作者是“业余”的,而且“他们只能写这一类作品”。倘若如此就构成了一种偏见、一种标签。创作者一旦被定义、被贴上标签,这份标签就容易变成沉重的包袱,进而影响其后续的创作。

因此,评人应该冷静、客观地对待这种命名方式,避免使之成为禁锢自己创作的枷锁。《作品》主编王十月曾提出:“因为这个标签,我们才被看见。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标签被看见了,享受了这个标签带来的好处,然后又觉得这个标签对我形成了遮蔽。一个真正有追求的或者有能力写作者是不会被这些标签所左右、所困扰的。所以,我的经验是,把这个标签当成我们身上的一个胎记,既不用回避它,但是也不用刻意地向别人展示说,‘来看啊,我的身上有一个这样的胎记。’”这一观点,恰与当下基层写作者面对身份标签的处境高度契合。职业标签是他们被看见的起点,是他们通往文学场域的阶梯,坦然接受即可。真正的写作者,就应该让作品超越身份的框定,让标签从“限定符”变成“出发点”。

命名,本来就是一件容易陷入两难的尴尬事情。创作者的思绪、随性迸发的灵感是无边无际的,你无法用一个词去死死框住它。慢慢地,我们会更加习惯这样的场景:文艺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创作风格五花八门。作为读者和评论者,我们不再好奇他们的职业身份,而是直接谈论他们的诗歌作品。当作品质量高低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文学艺术才算真正回归它本身。

到那时,评论者和广大读者会更加理性地看待这种命名策略,抛开所谓的命名之争,真正走进作品的世界,去认识一个个真诚而有活力的写作者。

(作者系广东清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声音

重审文学与生活的辩证关系

陈海燕

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生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现实比文学更精彩”的语境下,对这一命题的重新审视,又变得非常有必要。

毫无疑问,文学创作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外文学经典共同印证的创作法则。纷繁的社会图景、普通人的悲欢际遇,为文学提供了故事原型、情感基调与时代背景。一旦脱离现实生活的滋养,创作就会失去源头,变成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创作者只有沉下心来走进现实生活、感知时代,才能捕捉到独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心心声。巴尔扎克深入观察19世纪法国各个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记录时代更迭过程中阶层格局的变动与人性的复杂变化,建造出《人间喜剧》这座文学巨厦。这部作品也被称作解读19世纪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从鲁迅到老舍,从赵树理到路遥,一代代中国作家扎根于现实的创作,反映了中国百余年的发展步履。纵观中外文学史,无论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其精神内核始终锚定鲜活的现实与丰富的人性。创作者可以在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跳出表层现实的束缚,但人性逻辑、情感走向与时代脉络,始终不能脱离生活的根基。

但是,植根于现实,不代表写作者只能完全“屈服”于现实,在现实面前“亦步亦趋”。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琐碎琐事与临时际遇,生活中的素材杂乱无序,本身并不具备完整的审美秩序与思想价值。真正的文艺创作,是写作者凭借独立的思考能力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艺术的方式把握现实世界。创作者的核心工作,就是跳出一般的认知局限,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人间万象,对搜集而来的生活素材进行筛选、整合与提炼,使寻常

的市井故事、平凡的人物命运承载起关于时代、人性与精神的深度思考。譬如,鲁迅书写旧中国底层乡民,并未拘泥于单一人物,而是“杂取种种,合为一个”,塑造出阿Q这一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作品所展现的“精神胜利法”,精准戳破了旧时代国民的精神困境,让一个小人物的悲剧,上升为对整个民族劣根性的深刻反思。托尔斯泰笔下的爱情悲剧,同样跳出了世俗简单的道德评判,透过个人的情感纠葛折射出时代的复杂状况和人性的丰富侧面。这需要写作者具备思想的穿透力,实现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思想提升。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铁律。但是,有人把文学创作等同于对现实生活的机械实录,认为艺术加工就是刻意编造、偏离真实;也有人片面理解“高于生活”,将其等同于刻意升华主题、美化情节和预设观念。实际上,文学既不是对生活材料的简单复制,也不是脱离现实根基的凭空想象。与此同时,文学可以依靠思想力量突破生活表象,却不能无视生活逻辑与人性逻辑。文学与现实的理想关系,是创作者的主观创造和客观现实规律达成平衡。所有的刻意升华与艺术加工,都必须建立在尊重时代特征、社会规则、人物性格与人性本能的基础之上。这也是一部作品兼具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必要条件。真正优秀的文学创作,绝不会被创作者的主观意愿裹挟,更不会为了贴合预设的主题框架,强行篡改人物的抉择、扭曲现实本来的样貌。人物角色的言行抉择、性格蜕变与最终命运走向,都由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文化身份、个人性格等共同决定,而非一味迁就作者的表达诉求。所以,有些作家会感慨,写着写着,人物就脱离了作家的“控制”,走向了另一条人生之路。

这样看来,文学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

因此,创作者既要扎根生活、拥抱现实,也要注意穿透表象、深挖本质。这实际上也是优秀文学创作的常规路径:从具体的生活出发,又试图写出时代的整体格局。优秀的文学作品从不照搬生活的素材,而是用思想照亮现实,让读者透过文字,看见细节背后的规律、表象之下的本质和个体身上折射的时代精神。

当前的文学创作现场,存在这样两种现象:有的作品,聚焦的是非常琐碎的东西,但又无法从小生活、小事件中折射出时代的整体气象;有的作品,书写的是大主题、大题材,但陷入空泛的叙述和抒情,缺乏生动的细节和感人的形象,显得大而无边。这两种现象看似背道而驰,实则根源源于同一病灶:创作者在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时,要么失之于“过近”,要么失之于“过远”。失之于近者,被困在琐碎的表象里,缺乏穿透现实的思想锐度;失之于远者,漂浮在空洞的概念之上,缺少扎根生活的细节质感。前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后者则是“空中楼阁,失去根本”。这就需要作家对现实生活既要做到“深入其中”,又要做到“出乎其外”。深入其中,方可把握生活的肌理,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细节;出乎其外,方能跳出表象的迷障,在更高的维度上进行思想升华和审美提炼。

总而言之,新时代的作家只有真诚地奔赴生活现场、沉浸式体悟百味人生,将个人的细微体验与大众的共同情感、时代的快速发展紧密交融,才能让作品既有湿润动人的烟火气,又有厚重深刻的思想底蕴,真正实现以文学观照生活、以作品叩问时代。特别是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文学创作需要把那些看似无关的碎片重新缝合起来,在个体命运中呈现整体的时代气象、反映人民的普遍心声。

(作者系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书评

近期,“清气郁如兰·宋遂良文献与研究”新集两种“研讨会”在山东济南举行。参加这个会,我真是百感交集。面对已过鲐背之年的宋遂良先生,我有三重“角色”:一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同行与读者;二是受教于先生的学生;三是曾经的同事——虽然作为晚辈,但曾和他在一起工作十多年。所以,我观察和理解宋老师,便有了多个不同的角度。对我而言,他亦师亦友,我不只在学生时代受教于他,在工作最初的14年中受惠于他,在离开山东大学之后依然得益于他。宋老师之为人、与文给我的影响可谓终身的。他敏锐多思、文笔清俊,历经风雨,不改其志,是我人生路上不会迷失自己的精神灯塔。但还有更重要的,他是一个用世俗概念无法形容的朋友,是精神上的同道,是跨越年龄的知己,是能够平等交流没有“爹味”的长者,是永远可以信赖的忘年交。我与宋先生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天地君亲师”的伦理关系,而是一个平等的现代性的关系。对于山东大学这座学府而言,他是一块人文主义的磁石,在周围形成了强大的磁场,滋养着一种珍贵的精神。

从《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先生从成长到求学,到“从教、从文”到“为师、为批评家”的全过程。这是一个“简版”但格外生动的传记,也有关于重要节点的细致梳理与展开。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经由“史料”和“叙事”而生成的宋遂良先生的鲜明形象。这部书是“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展”的平行成果之一。没有王帅和臧杰的努力,就没有这些文献的展览,更没有这本书的出版。相比于他们,我很惭愧。20多年前,《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曾给我一个任务,写一写“从人到文的宋遂良”。记得也曾与宋老师长谈,但竟然没有做成这篇文章。想来除了懒惰,当时的能力还不足以写出真正的宋老师。而现在从臧杰的书中,我看到了这样的生动形象。

从《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宋老师的家庭环境、童年成长、所受的教育与影响。这是一个传统色调非常鲜明的家庭,良好的家教书学传统造就了他的正直与善良,也塑造了他知识分子式的复杂情结和经历。这些我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一点点理解的。实际上,从心灵的意义,我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理解。

在书中,还有一个“作为成长者和奋斗者的宋遂良”,这一形象是在“文献管窥”一辑中慢慢呈现出来的。从宋老师与老舍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学生时代就已有非常成熟的文学见地,可以与那个时期的著名作家对话;在与田仲济的通信中,可以看到田先生惜才爱才的胸怀,看出知识界的干净环境与纯真品格;以及刚到中年的充满文学朝气的宋老师;在和山东作家群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一个好的批评家对于一个地方的文学生态的不可或缺的影响;关于“茅奖读书班”时期的日记中,更能够看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风气、制度、运行机制,看出这一环境中怀揣文学理想和信念的宋老师是如何激扬文字的。它同时还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社会学案例。

由此我想到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历史如何记忆?当代的很多哲学家都在思考类似问题。在他们看来,社会记忆的形成,除了依托“制度化的庆典仪式”,还通过个人的现实生活和具身经验来实现。此外,按照福柯的观点,历史还通过个人日记、街头小报、大量非正统的知识流传下来。通过这些边缘化、个人化的历史材料,我们会获得对于历史的另一种认识。

作为“文献展”另一项平行成果,《复旦求学日记(1956-1961)》以个人日记的形式保存了大量鲜活的历史档案。从1956年到1961年,正好是中国当代历史剧烈变革的时期,从宋老师的日记中可以生动、“具身”微妙地看出历史的运行节奏。但最珍贵的一点是,它提供了一个“个体的心灵视角”,呈现了一个珍贵的精神案例。这将为未来的深入研究提供真实而丰富的素材。

展开这一行行文字,我们会看到一段丰富的历史。1956年的开放与生机在其中得以生动展现,譬如可以看到很多外国电影,看到中苏、中印的交往,大历史在这里似乎刻意地与写作者个人开一个巨大的玩笑;从日记中,我们会看到青年之间的交往方式,是那样的节制而充满纯真的热情;看到一个年轻人心甘情愿地深入生活、拥抱时代的积极心态;看到复旦大学和整个中国文学界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看到刘大杰、郭绍虞、朱东润、伍蠡甫等许多老前辈复旦学人的形象……

但最重要的,是它慢慢地为我们映现出了作者的形象:一个始终关注世界形势与社会变化的青年革命者,一个不断进行深刻的自我砥砺、艰难的自我反思的精神求索者;一个追求进步、乐于助人、内心充满阳光的纯洁的好青年;一个狂热的文学读者和有了“批评家雏形”的青年学者……我们可以看出他充满清醒与痛苦的内心,他强大的政治觉醒与本能的人性觉醒之间的博弈,他奔放的精神世界与压抑的心灵叩问之间的反复较劲。

准确地理解历史才能正确地把握今天。这些精神的斗争,成长的经历映照出历史的沟壑与方向。我们从中读出的,不只是历史的真相、青春的热血和灵魂的挣扎;我们也会无限感慨,这样一个人,如此充满朝气地、如此纯洁地走到今天,并且以其历经风雨依然充满“清气”的人生教育了我们。这是美好人性的胜利,也是历史的最终胜利。我想起北岛的诗句,“那是五千年的形象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历史因此而永远朝向未来敞开。相比他的同代人,宋老师在物质意义上的获得是最少的,但他的贡献却超出了学术和教育本身。他所获得的精神交会、生命互动和所受到的爱戴,当然也应该更多。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位学人的清气和磁场

从《新集两种》谈学者宋遂良 张清华

延安文学 接接地气 重写现实 有暖有意 社长:魏建国 总编:杨建 2026年第3期 要目 新时代红色文学 西部散文 栏目合办:中国人民大学 敦煌残卷里的女儿国/李娜 新时代红色文学创作与研究 九九归一/羊白 中心 却缘香甚蝶难亲/庞洁 詹娘舍【报告文学】 诗读本 /乔林生 我所经历过的一切/阿华 蔬菜大棚里的女人们 疲倦帖/梁小兰 [中篇小说]/曹洪波 红色记忆 不忘初心 鞠躬尽瘁 小说工场 不忘初心中 鞠躬尽瘁 女儿红/赵志伟 一纪念吴岱峰同志/姚文琦 驯豹记/彭泽 神泉堡:“中国人民银行” 重游/鲁静 名称的诞生地/李向前 美女/崔小微 人文陕北 求和/计虹 北京知青忆延安 连载三

内容经典化 传播大众化 素人写作 在阿非利加(非虚构) 明朋 中国故事 天选小生(中篇小说) 文清雨 杀时间(中篇小说) 夏群 幻方(短篇小说) 焦红珠 狩猎(短篇小说) 巫安振 户外生长(短篇小说) 赵命可 超新星大爆炸·王宁婧 我可能是艺术学院的那只野猪(访谈) 杜娟 周蕊 汤展翌 丁圣润 王宁婧 游荡,呼喊与文学的吉光片羽(印象记) 宋一诺 烧鼠鼠(短篇小说) 首 革(广东海洋大学) 推荐人:王嘉震 归一(短篇小说) 王 念(中央财经大学) 推荐人:周冰心 万物地图 乌伦古河(质感记录·非虚构) 邱华栋 废墟之上(质感记录·散文) 周芥林 汉学世界 尸蝶(海外华文·短篇小说) 【美国】刘 王 鼎 峰 微篇精选 喀喀喀果树保卫战(小小说) 潘 峰 恐龙蛋之谜(小小说) 王东东 大家手稿 诗歌的智慧(评论) 王东东 天下好诗 她们的诗:阿华 敬丹 李 云 路 亚 封面 郭逸柔 封二、封三 陈训勇 插画 肖凌峰 社长总编:王十月,副总编:郑小琼,副社长:李京春. 邮政代号:46-37. 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 零售:20.00元. 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 邮政编码:510635. 电话:020-38486216.

征集书稿 海心同行/辉煌共进/图书选题策划/文案设计制作/代理出版/推介宣传 南通海心文化艺术服务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与全国诸多品牌出版社合作,代理承接编撰出版业务,优质书稿每册有出版补助费用,书稿20万字内(内容涵盖文学、教育、科技、医学、社科及其他文艺学等专业门类),周期短,出版快,书稿出版社审核通过,签订代理出版协议。本公司长期征集书稿,保证一册图书一份CIP数据,版权页可以在中国最权威出版数据中心查询,愿意合作者请与本公司办公室联系。包容乃大的海心团队,将用无微不至的细心为各位专家、学者服务。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城区掘中中路28号海心文化公司办公室 联系人:欧阳文楠,联系电话:13813732486(微信同号) 邮购启事 2025年《文艺报》(原版)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定价:450.00元/全年,不另收邮资。 本报零售价:每份1.50元。北京地区挂号费3.00元(10份以内),其他地区挂号费8.00元(10份以内)。或另行告知其他方式寄送。 可以扫描微信二维码付款,付款时请备注购买人手机号并请发送短信或微信告知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